

论巴赫金的语言观*

郑海翠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 巴赫金是20世纪最具影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之一,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关语言的伟大论述几十年后才为世人所关注。本文回顾巴赫金先知先觉的言语研究,重现他深邃的语言观:语言的生命在于交际和对话;语言是人的思想和社会力量的体现和活动场所。巴赫金的语言观是社会性的、批判性的。纵观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巴赫金的语言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他的语言观对文体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特别是批评话语分析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 超语言学;意识形态的载体;对话性;语言的社会斗争性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5)01-0019-05

0. 引言

米哈伊·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文艺理论、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符号学等诸多领域,他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Dentith 1995)。近年来,巴赫金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并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本文重点探讨他的语言观。

20世纪初,“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所提倡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盛行,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封闭的、不受外界影响、不为个人所左右、具有一定任意性的系统(Saussure 2001)。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区分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指出语言的实际使用或具体表现,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言语是个人的、是附属于语言系统的,因此他们致力于研究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系统,有关言语的研究被边缘化了。

然而,巴赫金另辟蹊径,坚持研究被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摒弃的言语。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观点和理论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语言学界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开始对言语进行系统研究,语用学才应运而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赫金是当之无愧的语用学的开山鼻祖(Todorov 1984:24)。然而巴赫金不仅比语用学、话语分析、文体学等学科早几十年开始研究言语,而且研究得非常深入,他将语言研究引向言谈研

究,继而深入到话语研究,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有关言语的研究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无法与之相比。巴赫金对语言的研究不仅是独特的、创新的、前瞻的,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先知先觉的,因此本文拟探究比当今世界语言学研究早几乎半个多世纪的巴赫金的言语研究,再现巴赫金精辟的语言观。

1. 超语言学研究

索绪尔注意到了语言使用的动态性、社会性,提出了langue和parole两个概念,但却致力于研究语言规则,意在将语言概念化、抽象化、科学化。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langue,即语言系统。研究语言系统的语言学家,不是描述言语行为,而是确定组成语言系统的单位和组合规则。”(封宗信 2006:15)正如Dentith(1995:25)所言,结构主义语言学者认为,“语言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得像地理学一样去研究岩石种类,而不是去研究沙滩上的每一颗沙粒。”巴赫金也承认语言中存在规则,语言规则先于个人而存在并且不受单个个体的意识和使用所左右,但是他反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只研究抽象的语言规则的作法,他强调语言不是永恒的法则,不是一种封闭的系统,语言的生命在于交际和对话(Volosinov 1973),所以他提倡要在言语活动中探究语言的本质。

巴赫金认为:“语言,话语,几乎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但是万不可认为囊括全部、形形色色的现实世界只能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能通过语言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基金项目“蒙古族形象的多模态话语构建——解读草原歌曲”(编号:13YJAZH139)的部分成果。

学的方法去理解。”(Bakhtin 1979: 297)在众多学科和方法中,他认为应该从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两个方面去理解语言。与索绪尔不同,巴赫金更注重从人类交往活动来研究语言现象。巴赫金认为他所研究的超出了传统语言学的范围,相对于传统的主流语言学,他称自己的研究为“metalingvistika”,最先把巴赫金思想介绍给西方世界的 Todorov 和 Krestiva 将它翻译成“translinguistics”(Todorov 1984: 24; Krestiva 1986:40),即超语言学。巴赫金所云实际上唤起了目前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等学科对语言、社会和思想之间不可分隔的关系的超学科的探索。巴赫金超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正是为传统语言学所忽略的个人言谈(utterance)和话语(discourse)。传统语言学研究语言及其分支——音位、词汇、句法等,将具体言谈的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完全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力图建立语言规则和系统。但是,“语言系统是一种社会现象或一种社会体制,本身是抽象的,没有物质形式上的存在,只能在特定的场合通过语言社团的个体成员的语言行为得以实现”(Lyons 1981: 10)。与抽象的、可重复的语言单位不同,言谈是不可重复的,每个言谈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言谈实例之间靠对话关系维系,构成话语。话语是具体的、有生命的语言的全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研究重点在于揭示语言或话语的动态性、对话性、历史性和社会性。

2. 词的新解

在巴赫金的著作中,词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具有十分丰富涵义的概念。巴赫金理解的词绝对不是传统语言学中的有一定所指的静态的词汇因素(lexical element)。准确把握巴赫金理论框架中的词的含义对于理解他的语言观至关重要。

“在巴赫金所提议的更加宏观的概念框架中,词是有独特意义和意思的言谈,词的限定性特征是它的交际性和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aspect and intent)。这些特征使得词超越了单纯的逻辑关系或具体的语义关系而步入了对话关系。”(Danow 1991: 22)此外,不仅说话主体本身,他人的反应、他人所言也同样赋予言谈一定的特性,两种特性交汇渗透在同一个言谈中,便构建了特定的语义场(ibid.)。因为词中有了他人的声音或意旨(intention),所以词不再是词汇层面上的概念,而是对话关系的载体和对话关系发生的场所。词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而是永远处于变化中的对

话交际的媒介,词的生命在于不断变化着的交际中,在交际过程中,具体言谈对词的作用和影响都会记录在词中(ibid: 26)。只要词不是语言中不涉及人为因素的表达,而是某人语义立场的符号表现,对话关系就存在。例如,“stone”如果指自然界中的石头时,对话关系就不存在,而在“He is a stone.”这句话中,对话关系就存在,因为别人在使用这样的言语表达时所陈述的意思如“冷漠无情”或“铁石心肠”等都在“stone”一词中留下了痕迹,每个言语主体在重新表述时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语义产生对话关系。

词是语言最基本的构成成分,是一切人类交际的基础。但是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研究中,词不仅仅是语篇构建的最小单位,还是协调者、中间人,词将语言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将言谈主体、听话人、语境三个维度连接在一起。要实现这些功能,单个的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巴赫金在谈到词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指词语及具体的言谈。正如巴赫金所言,“对话关系要想展现出来,必须穿上词的外衣,成为言谈,成为话语主体在词中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Bakhtin 1984: 151)。可见,词语、言谈是对话关系和言语主体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词语、言谈具有对话性,并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此外,词对社会活动或社会变化最为敏感,每个词都是不同社会取向碰撞、冲突的场所,从每个人嘴里说出的话都是活生生的社会力量斗争的结果(Volosinov 1973),这就是词的社会斗争性。巴赫金对词的独特理解正是他深邃的语言观的一种反映。

3. 语言:意识形态的载体

一提到意识形态,有人马上将它和政府机构、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从某种角度讲,这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狭隘的理解,但从另外一种角度讲,这又是直切重点的见解,这看似一个悖论,实则不然。意识形态是指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但从深层次挖掘,每个人的思想并不像洪堡特等人所提倡的那样来源于个人心理(Volosinov 1973:50),而是受社会的影响,由社会因素决定的。巴赫金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①中就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

巴赫金认为与自然世界并存着一个符号世界,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可以用符号来表达,“意识形态域与符号域是吻合的”(Volosinov 1973: 10)。没有符号,也就没有意识形态。意识

形态符号不仅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反射或折射客观世界,换言之,符号可以基本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也有可能部分地再现客观世界甚至歪曲客观世界,其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规则和符号规则都受制于社会经济原则,巴赫金一针见血地指出:“意识形态现实就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ibid.: 13)作为一种符号,语言能够记录社会变化的每一个微妙时刻、每一个细枝末节,社会活动中涉及到意识形态的所有内容都能记录在语言中,所以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语言得以解释。

巴赫金认为,一切其他的非语言符号都被语言因素所包围,语言符号是众多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种。社会交际的符号性、连续性和可理解性只有在语言中才能清楚、全面地得以展现。“词是最典型的意识形态现象。”(Volosinov 1973: 13)实际上,我们从不听或听见别人说词,我们说的或听到的是真或假,好或坏,重要或不重要,愉快或不愉快等等,词总是充满了来自行为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意义(ibid.: 70)。词不仅是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反映,而且是意识行为活动必不可少的因素,因为意识只有借助具体的物质形式才能发展。由于符号和话语都是意识形态现象,话语的整个现实完全消融于它的符号功能之中,所以话语的意识形态内容正是在其物质表现——词中得以最好的展示。

巴赫金强调词不只是最纯的、最具指示功能的符号(Volosinov 1973: 14),而且是一种中性符号(neutral sign)(ibid.; Danow 1991: 25)。这里的“neutral”实际上指的是词的普遍适用性,与其他符号不同,词并没有被个别领域专有化而限定在其中,而是可以用于各个领域,它可以承担任何的意识形态功能:科学的、美学的、伦理的、宗教的等等。词的这种中立性(neutrality)导致了词的多音调性(multiaccentuality)。由于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而且都会在词中留下痕迹,所以词中渗透着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Volosinov 1973)。此外,由于不同的阶级使用同一种语言,各种不同的愿望或利益交汇在同一个词或表达中,词也就成了社会阶级斗争的场所。正是词的这种社会多音调性维持着语言的生命和动力。

任何有生命的意识形态符号都具有两副面孔。任何一个咒语都可以成为赞誉之词,某些人嘴里的真理对许多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弥天

谎言。巴赫金认为,符号、词的这种内部辩证关系只在社会危机或变革时期才会完全展现出来。在和平时期、在日常生活中,词的这种内部冲突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暂时隐退,他指出:“统治阶级总是力图赋予意识形态符号超阶级的永恒特征,扑灭它内部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价值的斗争,使它成为单一价值取向的符号。”(Volosinov 1973: 23)正是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语言无法真实地反映世界,而只是部分地再现甚至可能歪曲现实世界。

4. 语言的对话性

语言的对话性是巴赫金语言观的核心。巴赫金认为,“对话是语言生命可能存在的唯一领域”(Krestiva 1986: 39),语言只有在对话中才有活力。对话的含义不是简单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巴赫金的对话概念非常深刻、富有哲理。他认为,“词是一个两面的行为”(Volosinov 1973: 86),它既取决于由谁说出也取决于向谁说;词是说者和听者、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每一个词都表达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总是从自己所属的群体的角度来表达自我。词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桥梁,是说者和听者、发话人和受话人共享的领地。词的对话性也反映了词的思想性、社会性和多音调性,如前文所述,词的这些特征也就是语言所具有的特征。

Krestiva对巴赫金所论述的对话性进行分析后指出,语言在三个层面上有对话关系:首先,语言是二价结合体(combina-tive dyad),语言和言语之间存在对话关系;其次,语言系统或言语系统内部都有对话关系;另外,语言的对话性表现在横、纵两个方向上,横向对话性的明显表现是语言的外延和换喻,纵向对话性是系统的,它的突出表现是联想和隐喻(Kristeva 1986)。Krestiva的分析主要是从巴赫金的有关词的内在对话性得出的,还并不是对巴赫金语言对话性的全面描述。

词的内在对话性只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一个部分。巴赫金认为,有三种现象存在于话语中,并由话语的对话性所决定,而这些恰恰是语言哲学、语言学和文体学不予考虑的,这三种现象是:“一种语言内他人的话语,一种民族语言内的‘社会语言’,以及同一文化中的不同民族语言。”(Bakhtin 1981: 275)第一种情况实际上指的就是“互文性”,即每一个文本都是文本集合中的一分子,与已经存在的文本和即将产生的文本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互文性”的概念并不是巴赫金本

人提出的,而是 Krestiva 在巴赫金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的。互文性并非局限于文本,互文性在话语或具体言谈中都起作用,而且互文性几乎无处不在。任何说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应答者,他不仅依赖于他所使用的那一语言体系,而且还依赖于先前的表述(自己的和他人的表述),而他此刻的表述就要同先前的表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依靠这些表述、与他们争论、或者只是作为听者已知的前提),每一个表述都是其他表述组织起来的十分复杂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Kristeva 1986)。因此每个话语行为都是对已经发生过的话语行为的应答,而且作为话语链条的一个环节,期待着未来话语的反应。第二种情况,一种民族语言内的“社会语言”实际上指的就是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语言变异,如不同阶层、不同行业所使用的语言。第三种情况将语言的对话性放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例如,讲英语的国家,这是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又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如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等,尽管这几种语言间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共核部分还是远远超出了差异。如果说第一种对话性更多地还是纯语言现象,那么第二种已经很明显地体现了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作用,而第三种则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因素对语言演变的作用。

巴赫金在论述对话性时也提到了独白,他认为独白中也存在对话,言者与自我的对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内心激烈斗争的一段独白。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可能是独白式的,同样,所谓的独白也是对话的”(Krestiva 1986: 38)。对话是一切话语或语篇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话在语言中的体现只是程度上的强弱,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

综上所述,语言的对话性是语言的内在属性,语言内部各因素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对话;同时,语言的对话性也存在于语言外部,即存在于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总之,对话性和语言密不可分,语言的生命就在于交际和对话。

5. 语言:社会斗争之场

正如语言的对话性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一样,语言的社会斗争性也无处不在。单个的词或言谈都会体现出社会力量的作用。正如巴赫金所言,词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竞技场,不同价值取向、社会利益在词中相互碰撞、冲突,每个人嘴里说出

的话都是活生生的社会力量斗争的结果(Volosinov 1973)。关于词的对话性、多音调性、社会斗争性,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论述。然而社会斗争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内部,而且也从宏观上作用于语言。此处集中论述社会力量对语言的宏观作用。

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规定的、没有争议的封闭系统,巴赫金虽然承认语言的相对稳定性,因为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但他更加关注语言的动态性。他认为有两种力量作用于语言:向心力和离心力,向心力使语言趋于稳定不变,离心力使语言充满变化,向心力和离心力是社会力量作用于语言的宏观表现(Bakhtin 1981)。巴赫金认为:“统一语言(unitary language)反映出了使言语和意识形态达到统一和集中的各种力量的作用,而言语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又是和社会政治文化集中化紧密相关的。”(ibid.: 271)政府推行或强制执行标准语言就是向心力的最好表现。

实际情况是,语言中充满变化,除标准语言外,还有许多其他语言形式,这就是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而产生的异质语(heteroglossia)(Bakhtin 1981)。在语言发展的各个历史时刻,语言都会分化为各种形式,为大家熟悉并关注的是方言,方言主要是由语言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变化引发的。统一语言的分化和变异还会由其他各种因素引起,如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因此每个社会阶层、每个行业、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或语言形式。社会的变化导致语言的分化,形成了各种语言变体。分化是任何一种活语言内在固有的一种特性,而正由于此,语言才能保持其活力,继续发展。

此外,言语体裁的产生也是离心力作用的结果。每个言谈都是具体的、独特的,但是言谈又归属于某个相对稳定的言语群体,这就是言语体裁(Bakhtin 1986)。言语体裁由三个因素决定:言谈话题、言谈意志或计划、组织方式(Holquist 1990)。言语体裁也和语境、说话人的态度、立场以及想要达到的交际目的、社会目的紧密相连。每个言语主体在使用语言时不可避免地 and 一定的言语体裁发生关系,言语主体的社会身份、地位以及价值取向也反映在言语体裁中。

作用于语言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密不可分、紧密相连,“体现在统一语言中的向心力也在异质语中运作”(Bakhtin 1981: 271)。语言的异质性表现

了现在与过去之间、过去不同时代之间、当今不同社会思想群体之间矛盾的共处。因此语言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向心力和离心力、统一和分化相互作用,这种语言内部的斗争正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反映,语言也就成了一个社会竞技场。

6. 结语

巴赫金一生倡导对话,他关于语言的论述正是在与两种思潮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Volosinov 1973),针对以洪堡特为代表的个人主观主义,巴赫金批判了把语言视为个人心理现象的错误看法,指出意义不是来源于某个人,而是产生于人们之间带价值取向的社会交往活动。各种声音、各种价值取向都在言语活动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ibid),所以语言中浸透着各种意识形态。针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巴赫金指出,语言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体系,语言的生命在于对话,所以他提倡要对语言进行超语言学研究,要研究活生生的言语现象。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决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相反语言永远都是敞开的。语言是一个不停地变化、发展和生产的过程。语言是交际的、互动的,语言的对话性本质上就是人与人的交流和对话,是社会力量的对话,即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现实反映。

索绪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区分了 *langue* 和 *parole*,构建了语言研究的两个方面,并致力于研究语言的系统性、规定性;巴赫金的伟大之处在于在结构主义为主流的学术背景下独树一帜,研究言语,指出语言的生命在于交际和对话,语言是人的思想和社会力量的体现和活动场所。

巴赫金的言谈理论与语用学虽然都研究言语,但却有着质的区别。宁一中(2000)对此做过专门的比较分析,本文作者认为,除研究对象不同以外(语用学分析日常会话,巴赫金主要研究文学话语),二者本质的区别在于语言观的不同,语用学研究人们如何通过语言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巴赫金认为语言、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语言与人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阶级斗争密不可分,因此巴赫金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语言的社会本质进行了挖掘,这是 20 世纪后期才发展起来的语用学无法超越的,巴赫金的语言观是社会性的、批判性的,他的语言思想是语篇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之一。所以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巴赫金的语言观,再现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对语言研究的重大贡献。巴赫金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对

语言的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而且在于他先知先觉的远见卓识。

注释:

① 大多数学者认为, *Ma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一书虽署名为 Volosinov,但实际上是巴赫金的作品(参见胡状麟 2001;宁一中 2000;Todorov 1984: xi-xiii, 24 等),本文遵循这一做法,将其列入巴赫金作品之列。该书最早出版于 1929 年,被评论家称为上世纪有关语言的最好的著作之一(Danow 1991: 5-6)。

参考文献:

- 封宗信. 2006. 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状麟. 2001. 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 [J]. 外语研究 (2):10-15.
- 宁一中. 2000. 论巴赫金的言谈理论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3):169-175.
- Bakhtin, M. 1979. The Problem of text in linguistics, philology, and the other human sciences: An essay of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 // M. Bakhtin, *The Aesthetics of Verbal Creation*. Moscow: Bocharov: 281-307.
-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M]. Austin/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khtin, M.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 C. Emer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khtin, M.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M]. Vern W. McGee, ed. C. Emerson & M. Holqui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Danow, D. 1991. *The Thought of Mikhail Bakhtin: From Word to Culture*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entith, S. 1995. *Bakhtinian Thought: An Introductory Reader* [M]. London: Routledge.
- Holquist, M. 1990. *Dialogism: Bakhtin and His Word* [M]. London: Routledge.
- Kriestiva, J. 1986. *The Kristiva Reade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 1981.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ussure, F. de. 2001.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 Todorov, T. 1984.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Volosinov,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L. Matejska & I. R. Tutunik. New York: Seminar Press.

收稿日期:2014-12-02

作者简介:郑海翠,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

(责任编辑:李德俊)